

陶渊明组诗审美意蕴探析

胡小优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 四川南充 637009)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组诗作品蔚为大观,组诗这一形式在魏晋南北朝逐渐得到定型、成熟与繁荣。而在大诗人陶渊明的组诗作品中,从中不仅可以看出他对宇宙人生的诸多思考,更记录下自身在仕与隐两种生活中复杂且真实的思想与情感意绪。在形式上,组诗作品的形式与内容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陶渊明的组诗具有独特的思想和情感体验价值,堪称陶诗的优秀代表。

关键词:组诗 思想 情感 内容 形式

中图分类号:I 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4580(2012)03-0017-(04)

学界关于陶渊明诗歌的研究早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地步,但研究者们专门针对陶渊明组诗创作的论述却并不多。魏晋南北朝是古代文学组诗创作逐渐走向自觉、独立、成熟、繁荣的关键发展时期,这一时期著名的诗人几乎都参与到了组诗的创作中,而陶渊明无疑是闪烁着奇光异彩的大家之一。他创作了多达80首数量可观的组诗作品,对于他的组诗作品,有学者评价到“东晋时期,在组诗创作方面成就最为突出的当属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形影神诗》三首、《咏贫士》七首、《拟古》九首等都是极好的作品”。^[1]语言简明扼要地点出了陶渊明在组诗创作中的地位以及作品的成就。可以说正是由于借助了组诗这一特殊的创作形式,陶渊明不仅得以在诗歌中自由地进行宇宙人生的诸多思考,也较清晰地记录下他在出仕与归隐这两种生活中的特殊心理与思想情感。他的组诗作品呈现出陶渊明作为千古隐士形象的真实性与丰富复杂性,正是这种丰富性与复杂性建构起他固贫守节的理想人格。

一、“委任自然”中彰显理性之美

袁行霈认为“陶渊明的诗,不论是哲理性的,或者是抒情描写之作,常常透露着他特有的观察宇宙、人生的智慧,许多诗都可以看作一位哲人以诗的形式写成的哲理著作。”^[2]陶渊明在自我宇宙观与人生观的支配下诗歌迸发出异样的智

慧与理性,而他的宇宙观与人生观则是以“委任自然”为基础和原则,这种“自然”观使得他的组诗作品散发出理性的光芒。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以《形影神诗三首》、《拟挽歌辞三首》为代表的组诗作品中,两组作品均呈现出自然、理性、通透的美感特质。

在陶渊明的《形影神诗三首》中,这组诗写出了在自我价值困惑中三种不同的人寻找不同人生观指引的过程,其中理性精神逐渐得到体现。《形赠影》是形在感叹人生短暂表明及时行乐的人生观,整首大篇幅感性地抒发人生短暂无法得长生的悲叹,人与自然宇宙的对比中,这种焦灼更让形陷入消极的人生观中无法自拔;而《影答形》,影对形由于人生短暂而生的感性抒情有一定的认同与理解,但影的理性意识比感性情绪强烈得多,从词句与语气中可以感受到。如“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未尝异悲悦”、“此同既难常,黷尔俱时灭”、“立善有遗爱,胡可不自竭”影的理性大于感性,针对形的生命难永所提出立善留名的人生观,相比形的及时行乐的人生观更加积极;而在《神释》中,其中神道“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遇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

收稿日期:2012-05-08

作者简介:胡小优(1988-),女,西华师大文学院古代文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文学。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神在对形影两种人生观进行怀疑与否定之中，不仅建立起自己的人生观，更彰显出强烈的理性精神。最终《神释》篇里呈现出一种理性、自然、通达的人生姿态。

此外，在《拟挽歌辞三首》中也蕴含和隐现出这种理性气质。在三首诗中，诗人对于生死并非如魏晋人普遍的恐惧与期望求仙长生，而是泰然自然地面临生死问题。诗中冷静客观地想象叙写死后的自己以及周围的一切，在其一中诗的第一句就语出非凡“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一开始就看开了生死，不仅如此，死亡更让人摆脱世间一切是非得失与名利荣辱。其中又写到：“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其三中的“死去何所到，托体同山阿”个人生命的消逝与宇宙自然的永恒存在同在，可谓达到了理性的极致。

二、仕隐之中情感心理的丰富多样性

陶渊明身处晋末混乱不堪的时局之中，面对充满乱与篡的时代，他必须在仕与隐之间做出选择。组诗中不仅体现出他对待宇宙人生问题的理性、自然的态度，其中更清晰地记录了他在仕与隐两种生活中真实丰富的心理与情感状态。

（一）归隐之间的辗转与无奈

在东晋末最混乱的时期里，事实上陶渊明却先后在桓玄、刘裕、刘敬宣手下任职，屡屡出仕却又屡屡辞归，即表明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之中做着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又想归隐。尤其是在出仕时又想归隐这中情绪在组诗中多有流露。如《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诗二首》其一：“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洋溢着对于能再回旧居再见亲友的欣喜和急切的回家心情；而在其二：“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讷有几，纵心复何疑。”除了感叹行役艰苦外，更流露出对游宦出仕的悔悟和对故园的深切的怀想。

在选择隐居终老后对归隐前的出仕生活做出回想与反思时，也流露出无奈与悔恨的情绪。如在《归园田居诗五首》其一中称出仕是“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在《饮酒诗二十首》其十九中写到出仕原因及感受“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此诗中的“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一句则暗用杨朱泣路来表达道路选择时的彷徨与无奈。

（二）回归田园后的欣喜与苦恼

陶渊明隐居田园的选择是追求人性舒展、自然无矫饰的生活理想支配下的必然结果。而回归田园后的情感状态也并非单一化，而是欣喜与苦闷相反相生。

在他的《归园田居五首》、《移居诗二首》、《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诗二首》及《和郭主簿诗二首》、《饮酒诗二十首》等众多组诗作品中，田园生活中的一切都显出自在本色的特点。一方面，田园生活的宁静和农人之间真诚、淳朴、自然的人际关系，是陶渊明追求的生活理想的现实存在，他在耕读中得到的是内心真正的充实、适性、满足与欣慰。描写田园生活的组诗中充溢着的是欣喜与诗意。

另一方面，由其他的组诗可知，在漫长的归隐生活中，实际上陶渊明遇到了来自现实生活上的贫困艰苦与精神上感觉到的光阴虚度、壮志蹉跎的痛苦以及无人理解的孤独寂寞等诸多问题的困扰。在《咏贫士诗七首》其中一诗中写到“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而组诗《饮酒二十首》则将这些苦恼与烦闷进行了集合。序文中寥寥数句就定下这组诗苦闷、孤独的情感总基调“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在其十五中写出了时间的催逼与生命的短暂感。在其十六中写到“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弊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自己放弃了以前的生活和理想，付出了饥寒劳苦选择了归隐守节，最后却始终没被当时人所理解的寂寞。在其他如《杂诗十二首》等组诗作品中也可以深深体会到蕴涵其中的苦闷、烦恼与焦灼的情绪。《杂诗十二首》中的其一、其二、其三、其五、其七中，都充满了对时间流逝的高度敏感与老大无成的伤悲烦恼。典型如其二中的“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三）价值追寻中的困惑、明朗与坚守

陶渊明在特定的隐居时空中，对人生价值、存在意义进行积极思考与追寻，最终建构起固穷守节的自我隐士人格范式。陶渊明在《饮酒诗二十首》这组诗中对很多人生问题感到困惑由此进行积极的思考，感到困惑的很多问题如怎样看待人世间的衰荣不定，对于天道无常与人道不公的疑惑，如何处理身后名声与现实乐趣二难问题，

是与非、名和利的界限等。诗人分别在在其一、其二、其三、其六、其十一中想通了这些问题，在思想上经历了一个从困惑到豁然开朗的过程。

当陶渊明解除了思想上的种种迷障后，在隐居这条人生道路的认识上也变得日渐明朗、清晰和坚定。而在逐渐坚定隐居的人生选择并最终坚守固贫守节理想的过程中，古人无疑是陶渊明学习的榜样与不竭的精神源泉。以《咏贫士诗七首》为代表，《咏贫士诗七首》中的其三、其四、其五、其六、其七中分别罗列了古人荣启期、原宪、黔娄、袁安、阮公、张仲蔚、黄子廉，这些古人与陶渊明在性情、志向上有着相似之处，陶渊明对他们既称赞敬慕更有自勉的意味，并从中思考着自己的人生选择。古人已经成为精神支柱，支持他抵御名利诱惑与世人的不解，能执着坚守内心的道德原则，换取心理的平静与精神的高洁。正如《咏贫士诗七首》其二中所写到的——“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见言。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

在饮酒组诗中，陶渊明对隐居生活坚定的情感却是以多种方式呈现。如在其四中，诗人借“鸟”找到孤生松托身来比兴寓意暗示自己已摆脱了彷徨困惑，找到了足以安顿身心的所在。而在陶渊明的组诗中，“鸟”即是自我形象的化身；在其五、其七、其八、其十四等中，表面上虽看似旨写他归隐田园后平常的生活与惬意、沉醉的精神状态，但蕴含其中的深意却是愿意以此终老。如其七中所说“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而在其十、其十七是陶渊明则是通过对过去出仕生活的悔悟与觉悟来认定现在隐居选择的正确。如其十结句“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其十七结句“觉悟当念还，鸟尽废良弓”。此外，引用典故来再次坚定自己的选择也是方法之一，如其十二中对张长公和杨仲理辞官选择的肯定中，也是对自身辞官归隐的坚定。而此诗中的“在兹一往便当已，何为复狐疑？去去当奚道，世俗久相欺。摆落悠悠谈，请从余所之。”则集中明确地说出了隐居选择经历了从犹豫到认定与坚持这一心理过程。

三、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

（一）组诗形式选择的必然性

陶渊明的组诗作品从思想上和艺术上都为后人称道，堪为陶诗的优秀代表作。而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产物，诗人采用了组诗这一形式是创作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形式的选择更有其深刻的必然性。

陶渊明之所以采用组诗这一形式，是由诗歌内容的表达与特定的时代背景所决定。“从文学的创作过程来看，作家总是根据一定的内容选择和确定相应的形式。作品的具体形式除了决定于内容的客观因素之外，形式还取决于作家的主观条件。作家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审美观念和艺术趣味、文艺修养以及本人的个性，决定了他所采取的艺术表现方法以及艺术形式。”^[3]即内容对形式具有制约作用，陶渊明组诗中的主要内容多为在乱世中自身人生道路选择的迷茫与宇宙人生的诸多问题的困惑与思考等，处于乱世间的诗人陶渊明心绪茫茫、感慨深沉，诉诸于文字表达则表现为内容的庞杂、错综与阔大。因此，这一内容上的特点需要一种特殊的创作形式来适应和驾驭。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治上充满动荡、黑暗、混乱，然而在思想文化上又是极其自由多元的时代。这一时期社会秩序被不断打乱，政局频繁变化，诗人的生活也处于不停的颠沛适应之中。由是寄寓诗歌之中的感慨与人生思考遂多。而传统的单篇抒情的诗歌创作形式，显然已经不能再适应这种充分表达的需要，而组诗以其篇幅容量巨大的特点在魏晋诗歌创作中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正如研究者指出：组诗的组合不是随意拼凑，而是诗人心灵的聚合。无论是叙事、写景或抒情，组诗都能起到单体诗歌无法起到的作用。^[4]而组诗也正是在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下开始在魏晋南北朝逐渐走向自觉、成熟与繁荣。陶渊明采用组诗这一独特的形式与体制，淋漓尽致地演绎着自身丰富复杂的内心情感世界。

（二）组诗内容与形式的相得益彰

1. 组诗形式上的成熟

组诗经由陶渊明的创作实践，在形式上从诗题、序言、题材风貌、结构体式等多方面都日臻成熟，为五言组诗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较为成熟的范式。

在组诗的形式上，魏晋南北朝五言组诗的诗题大致走过了一个由无题而有题、由题意模糊而题意明晰，由粗略而详细的历程。与前代相比，陶渊明的五言组诗的诗题内容明显有详细化的倾向，其命题的方式在继承中又显得灵活自如。在建安赠答诗中常标示人物，以赠、答、和等字加被赠人的名构成题目，陶渊明的《和郭主簿二首》诗题，明显继承了这种命题方式，然而题目中不直接称呼人名，而是称呼官职，这又与晋宋时期的礼仪相符。在诗题中标示事件的如《移居二首》，《归园田居五首》、《饮酒二十首》等继承了

这种命题方式。而将事件、时间、地点、人物等因素联合起来进行命题，这类诗题最为详细，陶渊明组诗中也继承了这种命题方式。如《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癸未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中更以甲子纪年是陶渊明的独创。在《形影神诗三首》中每首都加小标题，在总题目之下根据内容添加小标题，在此后作为一种传统延续下来。这样使得组诗不仅表意清晰形式上显得别致。

魏晋时期，五言诗诗题下加小序的几乎没有，而在四言诗和赋等文体中题目下加小序的倒不少。究其原因与五言在此期被视为“流调”的流行通俗诗歌体，在五言组诗题下加序的意识并未形成有关。陶渊明在《形影神诗三首》、《饮酒二十首》诗题下加序，序言皆短小精悍，简明扼要地交代写作因由缘由。这种与四言诗加序的传统分不开，更是陶渊明写作自觉的一种体现。在五言组诗前加序文的形式传统被承传，这种韵文与散文的交相辉映，形成独特的审美与表达效果。

在组诗的题材内容上，陶渊明的组诗体现出承传的特点。组诗主要集中在赠答、行役、田园、咏怀、拟古、咏史、杂体等前代常见的题材上，在继承学习前代的基础上，抒写的却又多是自己的情感意绪，在摄取魏晋组诗创作风格神的基础上，却有着自己的神韵与个性。

陶渊明在组诗的结构安排上如葛晓音阐述到的“在每组诗内部的结构安排上也更见匠心。如《咏贫士》赞美安贫乐道的道德气节。第一首比兴虚写贫士的清高孤独，第二首通过描摹具体生活细节实写饥寒困苦。以下五首举孔门师徒和草野高人等古代贫士，作为自我写照，内容更加全面，穿插更错综复杂。《杂诗》则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说法不断咏叹光阴流逝、有志难展的痛苦。”^[5]

2. 形式与内容的相符相生

陶渊明的组诗不仅在形式上日臻成熟与精致，组诗在形式与内容上更达到了高度的融合，使得每组诗各有特色并散发出不同的美学意蕴。如《形影神诗三首》以组诗的形式来各自阐发人生观，三首诗犹如三人之间的辩论，理性思辨与感性抒情、议论兼有，构思巧妙而内容也不枯燥，且贴近实际，生发出一种理性生动之美。《拟挽歌辞三首》前人评价到“陶渊明挽歌首篇乍死而殓，次篇奠而出殡，三篇送而葬之，次第秩

然。”^[6]诗中前后相继叙写了整个送葬过程，三首诗犹如由三联组成的一幅完整的送葬图，其中将叙事、写景、抒情与议论都巧妙地安排在各个环节，而采用组诗的形式写来，便有一种深沉大气徐缓有余之美。《饮酒诗二十首》中思虑感慨甚多，看似杂乱的写作结构中却意脉不断，有一种形散神聚一唱三叹之美。而《拟古诗九首》得阮籍咏怀组诗精神，叶嘉莹讲到“陶渊明的拟古九首都是讲的在朝代、人世改变的时候那种不同的现象，种种不同的反省，也就是他内心种种不同的反复低回的思量。”^[7]在抒写中寓意深远情思难测，有一种萦回往复渺然慷慨之美。

陶渊明的组诗少则二三首，多则五首、七首、九首、十二首、二十首，虽然篇幅不等内容各异，但从中却都体现出强烈的抒写意识与写作自觉。这种自觉意识使得他运用语言文字及时记录下自己的实际生活、理想追求与对宇宙人生的思考。组诗中集中展现出他对于自然人生人性的热爱，对于宇宙人生的困惑与人生道路选择中的矛盾与苦闷，对于有限生命价值的追寻与坚守。组诗作品呈现出陶渊明作为千古隐士形象的真实性与丰富复杂性，正是这种丰富性与复杂性是他固贫守节的隐士人格得以建构的关键。陶渊明的组诗作品具有永恒思想和情感体验价值。

参考文献:

- [1] 王今晖. 魏晋五言诗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196.
- [2] 袁行霈. 陶渊明研究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2.
- [3] 黄展人. 文学理论 [M].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0. 35.
- [4] 李正春. 论组诗文体特征与表达功能 [J]. 学术交流, 2007(10): 150.
- [5] 葛晓音. 八代诗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126.
- [6] (清) 邱嘉穗. 东山草堂陶诗笺 (卷四)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312.
- [7] 叶嘉莹. 叶嘉莹说陶渊明饮酒及拟古诗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324.

(责任编辑 秦川)